



台江苗族

礼仪文化及其变迁研究

罗连祥◎著

台江苗族 礼仪文化及其变迁研究

罗连祥◎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及其变迁研究/罗连祥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08-3193-5

I. ①台… II. ①罗… III. ①苗族—礼仪—研究—台江县 IV. ①K892.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487 号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及其变迁研究

作 者 罗连祥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193-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揭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依据，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文化类型众多，丰富多彩。若以秦岭为界，北为旱地小麦文化，南为稻草文化；如以瓯琿——腾冲画线，东为农耕文化，西为游牧文化；若以地方特色命名，我们又可以将中国文化分为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大致属于三个文化圈：蒙藏佛教文化圈、新疆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然而，地处儒家文化圈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上古时代，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尔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文化被逐出殿堂和中原，退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贵州省台江县地处西南边陲，为历代中央王朝的“化外生苗地”。但若以“巫文化”论之，它却是“巫文化圈”的中心，可算是“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在贵州省台江县却得以保存，真可谓“礼失而求诸于野”。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数的95.68%，是全省乃至全国苗族人口所占比例最大的苗族聚居区，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苗疆腹地”之美称，成为无数专家学者们研究和考察苗族文化的摇篮。

苗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与华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他们并称为中华民族三祖。之后，因战乱所迫，许多苗族不断向贵州山区迁徙并生息繁衍下来。专门研究苗族历史与文化的

学问被称为“苗学”。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曾先后展开了对贵州苗学的研究。在古代，关于贵州苗学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员，而且多为记述当地苗族先民的历史迁徙和生活习俗等。至清代，清政府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并有诸多苗族著作问世，但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并主要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苗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许多民族学者对贵州苗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贵州各民族自治地方也编写了相关的苗族志或苗族概况。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贵州苗学研究主要是“政府行为”，即苗学研究由政府组织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贵州苗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许多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进入21世纪，我国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在以往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许多重要成果相继问世，达到新的高峰。

在当前，苗学研究依然任重道远。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一些传统问题有待从新的视角考察探讨。然而在所有任务中，我认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苗族文化发生的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运动使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与我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叠加，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民族文化能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还有没有未来，能不能继续生存并得到发展，引起一切后发展民族的警觉与思考。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多元化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民族文化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研究保护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使之发扬光大。这是今天我国56个民族面临的共同任务。就苗族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苗族社会的发展进步，苗族同胞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地区，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依然发生了剧烈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这一变化会给苗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

尤其是苗族同胞自己，应该如何评价这一影响，应该怎样应对这一影响，苗族文化中哪些已经失去生命力，哪些不但还有生命力能够继续生存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负面现象，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苗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本书作者罗连祥是苗族学者，对于研究、保护与发扬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最具典型意义的台江县为例，以礼仪文化这个微观角度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当地苗族文化的历史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变迁，努力对上述问题做认真的研究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边缘化境遇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相反，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形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解释世界和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而且它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信仰至今仍具有超越生活需要的人文价值。时至今日，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依然存在并受到现代人的青睐，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丰富的形式和完整的品格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价值选择的可能。作者在遵循台江苗族传统礼仪文化原貌的基础上，对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基本特征、当代价值及其现代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的苗族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振兴和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罗连祥是年轻的哲学博士，受过系统的学术研究训练，已经在苗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的学术成果，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专门著作。他把苗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我相信他一定会在这一领域不断开拓，取得丰硕成果。

安启念

2014年6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3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本研究的学理基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24
第四节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意义	34
第二章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形成	37
第一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	37
第二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因素	44
第三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因素	50
第三章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内容	61
第一节 信仰礼仪	61
第二节 丧葬礼仪	86
第三节 婚姻礼仪	97
第四节 节日礼仪	106
第四章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139
第一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基本特征	139

第二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148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变迁	167
第一节 信仰礼仪的变迁	168
第二节 丧葬礼仪的变迁	174
第三节 婚姻礼仪的变迁	178
第四节 节日礼仪的变迁	182
第六章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变迁的原因分析	189
第一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变迁的客观原因分析	190
第二节 台江苗族礼仪文化变迁的主观原因分析	209
第七章 保护和发展台江苗族礼仪文化的对策	221
第一节 加强地方政府立法	222
第二节 培养苗族文化主体	226
第三节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237
结语 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共筑人类美好精神家园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48

第一章 导 论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

——马克思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②

——恩格斯

哲学对文化的追问首先是“文化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指出，文化构成了一种生产形式或生命活动所制约的生命表现形式。人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③ 上述论断表明，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特有的生存方式，或更严格地说，文化是指“作为群体或类的人的活动方式，……是人的群体或类借以相互区别或与他类区别的依据”。^④ 文化根源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它作为人类社会交往实践的象征符号系统，必然以思维方式、意识方式、风俗习惯、情感方式等形式体现出来，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④ 李述一、李小兵：《文化的冲突与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并与人的一切实践创造活动相对应。人是文化的主体，任何文化实践和创造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人的现实世界不是给予的世界，而是经人自己的活动参与创造的世界，……在这种活动中，人以物的方式从事活动，也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和对象世界。……人的现实世界就是属人的世界。它是深深地印上了人的足迹、投进了人的身影、贯注了人的本性，即对象化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世界。”^① 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确证了主体自身。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主体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人的自我完善主导着人的各种文化追求。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反过来塑造人，人总是在文化世界中成长着，发展着，文化的本质是人。

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②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来说，它都要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现实文化与人生是哲学永远无法回避的精神关怀，哲学唯有对文化和人生世界进行沉思才能显示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征。关注时代、反映时代是哲学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凸显了人类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人的异化、人的价值、人的社会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人类越是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自己，而简答人性之谜却离不开文化。因为文化构成了人类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反思能够洞悉出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文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文化向现实生活的拓展表明，人不仅要科学而理性地生活，而且人的生活还应充满美和诗意，人类更向往“诗意的栖居”。因此，关注人类文化，倡导人类实践活动的人文理想和人文关怀，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不仅是当下人类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更是哲学反思现实世界的基本价值向度。在当代，文化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时代课题。

① 高清海：《哲学回归现实世界之路》，《社会科学战线》，1993（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文化作为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文化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彰显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总是处于不断的自我超越中，当今世界文明是人类在进行文化创造、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胡锦涛同志曾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日积月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化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① 因此，在当今时代，研究民族文化，了解民族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民族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发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两千多年前《诗经》的采集和整理，是当朝统治者为了观风俗以正得失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代表团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以及现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等等，都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复杂国际背景下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关照，这种关照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①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11）。

尽管这一举措来得稍微迟缓一些，但是这项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工程，必然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我国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动力

2001年5月18日，随着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遴选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掀起了高潮。2003年1月23日，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4月8日，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同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一次会议，此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批准决定。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我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增加了510项。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也高度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展开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特征、价值、功能、保护措施等相关内容的研究。随着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和理论的深入探讨，许多学者相继从历史学、经济学、博物馆学、社会学、民族学、美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为我国制定相关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政策提供了学理上的说明。

2005年12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确立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在2007年6月到2010年6月，我国文化部相继设立了闽南、

徽州、热贡、羌族、武陵山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及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尽管当前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迫在眉睫。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消亡和衰减的客观事实,要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信力,建立平等的族际交往关系,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不可或缺。我们只有全面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把握它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深刻了解它的特点、发展趋向、价值和意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民族和谐相处、社会和谐进步的美好夙愿。

二、选取台江苗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本研究选择贵州省台江县苗族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台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山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城,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世代生息和劳作在这块土地上的苗族人民,创造出了与当地地理环境相适应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台江县境内重峦叠嶂、森林茂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使当地苗族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苗族人民与外界联系和交往困难,苗族文化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少,台江苗族传统文化保持得较为完整。直到清雍正“改土归流”时期,台江地区还处于所谓的“生苗区”,民风古朴。中国苗族一半居住在贵州,贵州苗族的一半又居住在黔东南。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苗族人口210多万人,分布在全州16个县市。其中被视为苗疆腹地的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68%,全县人口几乎都是苗族。该县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美称。台江县自古以来就是中外学者发掘和研究苗族文化的理想之地。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政权深入台江苗族地区，才打破了台江苗族社会的封闭格局。因此，传统的台江苗族文化不仅是当地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生活根基，同时也是当代人们考察苗族文化的重要的对象性存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笔者作为一位贵州土著苗族后代，三十余年的乡村生活使自己对本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了解尤深，苗族基本的生活常识和行为规范深深地积淀在自己的脑海中。作为一个苗族文化个体，本人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发掘、保护、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通过三年的理论学习，提高了自己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使自身对苗族文化的理解由原初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变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选择“台江苗族礼仪文化”作为个案研究，其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研究台江苗族文化，增强广大苗族民众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以此促进人们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笔者希望通过对台江苗族文化的个案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研究理论，发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有益贡献。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苗族既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同时又是一个世界性民族，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因此，国内外涉及苗族文化的研究资料与文献庞杂繁多。笔者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材料，以时间为序将苗族文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从九黎时期开始,有关苗族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五千多年,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自文明社会以来,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和苗族迁徙进程,人们对苗族的考察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古代、近代和现代,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成就和特点。

(一) 古代苗族文化研究

自文明社会开始到封建帝制灭亡,跨度几千年,我们称其为古代苗族研究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根据先人们对苗族文化研究的进程和特点,以宋代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有关苗族的资料,纯粹是记载或记录,这些记载为后来的苗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历史线索。

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出现了关于苗族先民的最早记载和描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尚书·舜典》中的“窜三苗于危”、《韩非子·五蠹》中的“当舜之时,有苗不服,舜请伐之”、《墨子·非攻》中的“苗师大乱,后乃逐几”、《战国策·魏策》中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等,《荀子》、《礼记》、《吕氏春秋》、《资治通鉴》等著作中也有零星描述。但这些记述主要反映的是苗族先民的居住地域、传说故事、生活习俗以及苗族先民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活动等,其内容基本上属于“记述民族学”之范畴。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苗族的记述主要体现在《汉书》、《后汉书》、《通典》、《三国志》、《华阳国志·南中志》、《水经注》、《北史》等著作中。例如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马援传》两部著作中,分别讲述了关于“盘跨蛮”的传说和苗族与封建朝廷之间冲突和斗争的历史。从司马迁著《史记》伊始,中国历代官修的正史皆有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述,

与苗族有关的地方志与民间著述也相继出现。

第二阶段，宋代以后历史文献对苗族不仅仅是记述，而且对苗族文化已经有所研究，尤其是一批文人，开始考察苗族的族源，调查记录苗族的生活习俗和苗族的反抗斗争历史等。

宋朝对苗族进行记述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十国春秋》、《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贵州通志》等。在个人著书立说方面，朱熹的《记三苗》、宋濂的《宋学士文集》、朱辅的《溪蛮丛笑》、洪迈的《容斋随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蛮》、周去飞的《岭外代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樊绰的《蛮书》等苗族著作较为有名。元朝时期，在元朝《正史》中，人们以规范的形式记录苗族族称，将苗族称为“苗（猫）蛮”。同时，为了区分不同支系的苗族，人们将其地域名称加注在苗族族称之前，如紫江地区的苗族称为“紫江苗蛮”、平伐地区的苗族称为“平伐苗蛮”、桑洲地区的苗族称为“桑洲苗蛮”等。在现存的《明实录》中，元代之前人们仍然将苗族称为“苗蛮”，而在元代的《南村辍耕录》和《异域志》等著作中已经开始使用单一的“苗族”族称。明朝时期，中央王朝的统治逐渐深入到我国西南地区，明朝典籍关于苗族的叙述更加具体，此时涉及苗族的文献资料有《贵州途经新志》、《贵州通志》、《平播全书》、《万历武功录》、《万历野获篇》以及郭子章的《黔记·诸蛮》、徐弘祖的《黔游日记》、张廷玉的《明史》等。其中，《万历野获篇》讲述了苗族的诸多史料，而且内容极为翔实，遗憾的是至今人们并未对其进行梳理，这些史料在苗族研究中也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万历武功录》、《平播全书》则主要记述了苗族反抗封建朝廷的事实。这一时期在贵州省内，各州、府、县及卫所，凡是有苗族定居的地方都有关于苗族传说和苗族风俗习惯的专门介绍。明代后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私家藏书，如田汝成的《炎徼纪闻》、侯加的《苗徼纪事》、沈瓚的《五溪蛮图志》和王士性的《广志译》等。这些藏书均以西南诸省为背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

田汝成的《炎缴纪闻》。《炎缴纪闻》介绍了地方行政土司世袭和苗族的反封建斗争以及西南诸省各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状况，这其中既有对苗族文化的系统论述，同时又涉及苗族内部各个支系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相关的政治事件。

清朝时期，我国学者对苗族文化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清初出现的苗族私家著述《黔书》和《续黔书》中，《黔书》对苗族各支系进行详细梳理，揭开了我国研究苗族支系的序幕。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将“生界”内的苗族纳入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苗族引起了官方的关注，这一时期各专家学者对苗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皇清职供图》、《贵州通志》以及陈浩的《白描图》三部著作中。到了清朝中后期，出现了诸多苗族文化研究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爱必达的《黔南识略》和《苗防备览·风俗考》、田雯的《苗俗记》、李宗昉的《黔记》、徐家千的《苗疆见闻录》、方亨咸的《苗俗纪闻》、刘书年的《苗度记略》、田英彦的《平苗议》、龚柴的《苗民考》、陆次云的《洞溪纤志》、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贝青乔的《苗俗记》、韩超的《苗变记事》、方显的《平苗纪略》、刘应中的《平苗记》、但湘良的《湖南苗防屯政考》等。另外，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书籍中，也有关于苗族史实的记载，如道光年间的《贵州府志》、光绪年间的《铜仁府志》等。

（二）现代苗族文化研究

民国时期对苗族的研究，我们称为现代苗族文化研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早在光绪末年（公元1908年），就有人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读者。随后西方人类学相继传入中国。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我国学者开始综合考察苗族的族源、迁徙、语言、习俗、信仰、经济生活等。我国著名学者蔡元培留学德国学哲